



厦门大学图书馆危机应对的历史启示与实践

——以内迁长汀为例

□徐文蕾*

摘要 以抗日战争时期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危机应对事例为研讨对象,通过搬迁历程、在汀发展以及胜利复员三个方面的回顾,追溯厦门大学图书馆内迁长汀这一历史事件,归纳分析与此紧密关联的一系列举措,探寻其中蕴含的应急管理之道。厦门大学图书馆内迁长汀是危机应对的成功案例,给当下新冠疫情的应对提供诸多启益,无论是应急预案的制定、应急服务的开展,还是应急人文关怀的关注,都可以溯本求源,同时也为高校图书馆未来的应急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厦门大学图书馆 内迁长汀 危机应对

分类号 G25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1.02.016

1 引言

因遭遇 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厦门大学图书馆被迫随学校西迁长汀,事件全过程可被视为高校图书馆较为成功地应对突发事件的典型案例。首先,学校对当时日军入侵的情势做出了准确判断,为图书馆紧急情况下规避、迁移制定了具体可行的周密预案,进而把损失降至最低程度;其次,甫一迁至新址长汀,图书馆即充分发挥了“心脏”功能,迁徙与复用之间的时间差极尽其短;第三,厦门大学图书馆于抗战胜利后回迁复员,一时千头万绪却有条不紊,体现出了快速高效的处置力度。厦门大学图书馆迁汀经历联结着国运校史,虽然渐渐成为一段少为人知的往年旧事,但鉴于厦门大学特殊的校情、馆况,特别是新形势下各种突发危机事件,如自然灾害、网络攻击以及疫病暴发流行等不确定、难控制的特点,那段过往历史依旧可以为图书馆人提供历久弥新的宝贵经验。本文即以厦门大学图书馆内迁长汀为探讨主题,在致敬先行者的同时,深入挖掘它留给图书馆界的有益启示,以期为当下“抗疫战争”及未来图书馆的应急管理提供借鉴。

2 厦门大学图书馆内迁长汀详情

2.1 内迁长汀过程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厦门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

到任校长萨本栋依据《大学组织法》及现实需要进行行政集中,使学校各部之间有机联系起来,他认为“现在不是一个推诿责任的年代,所以事无大小,我都要亲为或与闻”^[1]。而“图书一项,实为大学命脉所寄”^[2],格外受萨本栋重视。在厦门大学收归国立的过程中,内部行政人员多有更换,图书馆主任俞爽谜亦离职而去。萨本栋接手厦门大学后,为一时之计,紧急新聘一批职员,图书馆继任主任曾郭棠代行主任一职,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图书馆的内迁规划部署可以说是由学校特别是校长萨本栋统筹实施。萨氏心思缜密,甫一获知旅厦日本侨民撤退信息,即“飭属将图书、仪器、标本等,以迅速等手段陆续装箱借备万一”^[3]。日军侵袭厦门后,厦门大学因校区处在敌我争锋的要冲,暂时迁至“万国公地”鼓浪屿,重要图书资料等一并移入。其时,国内高校大多西迁或计划迁徙西北,萨本栋秉承校主陈嘉庚的办学宗旨,以延续东南文脉为大任,在科学分析抗日局势的情况下,最终择定福建、广东和江西三省交界的长汀为迁避之所,利用崇山峻岭的掩护全力办学。档案资料显示,选址长汀后,萨本栋于 1937 年 11 月至翌年 1 月先后四次召集专题会议,详尽讨论包括图书搬运等在内的迁校议题^[4]。后续事实证明,这样的规划与部署,为图书设备的保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 徐文蕾, ORCID: 0000-0001-8142-024X, 邮箱: wlxubb@xmu.edu.cn。



客观条件。

1937年12月,厦门大学图书馆随学校迁往长汀,“当年厦门到长汀,要渡过鹭海、九龙江及十几条溪流,越过多座崇山峻岭,道路崎岖,土匪出没”^[5]。学校最初筹划全体师生与绝大部分已经装箱的图书等物品同时起程,但后来由于车辆、交通等原因,只能把紧要及急需书籍先行运送,其余部分则暂时存放于鼓浪屿、漳州和龙岩等处,然后陆续分批次外运至新校区。其中经漳州暂存的图书仪器计有1000多箱,为保证运输途中的安全,“萨本栋先后给第七十五师司令部、水警第二大队部、福建省第六行政督察署、厦门海关监察署、厦门海关税务司、厦门警务司令部等十余个部门亲笔发函,请予以签发通行证并予以随行保护”^[6]。良苦用心换来较少失损,根据迁汀后图书馆方面的统计,“图书之不及搬运者,约计中文8000余册,西文3000余册”^[7]。相较之下,“平、津、京、沪各地之机关学校,均以变起仓促,不及准备,其能将图书仪器设备择要移送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部随校舍毁于炮火,损失之重,实难计数”^[8]。更有高校图书馆西迁途中因遭遇敌机轰炸,仅珍善本书籍损失就多达万册以上者^[9]。国难危情面前,厦门大学图书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损失较少,诚如陈嘉庚所言,“比之他省诸大学迁移,书物有丧失殆尽者则为幸多矣”^[10]。

2.2 长汀时期馆藏建设与读者服务

厦门大学图书馆初创之时虽有些先天不足^①,但在校长林文庆的一贯重视下,经由裘开明、俞爽谜等专业人士前后相继开拓经营,1935年前后已获长足发展,“西文书籍,刊物之完善,据说为国内各大学图书馆所罕见”^[11]。又因迁移过程中损失轻微,因此具备了良好的馆藏基础。迁汀后一段时间,图书馆主任改由校秘书杨永修兼任,除了按旧例成立图书委员会外,又增设学生用书用具探划委员会,协同选购图书,处理馆务。1939年图书馆内部分设订购股,专门处理中外书刊订购事宜^[12]。1941年,仿效清华大学“教授治校”成例,设立以法商学院院长冯定璋教授为主席,图书馆主任和其他教授为委员的学生用书划购委员会,进一步提高馆藏质量^[13]。经费方面,学校不仅列有图书专项经费,还设法争取各种补助款项。迁汀之初,此前中英庚款委员会补助私立厦门大学的四万元即悉数购置图书、订阅期刊。1940年秋,又在外汇、运输等极为艰困的情况下,购

买中外文图书3000余册。翌年,学校争取到中英庚款委员会及教育部补助约国币46万元,其中一部分亦用来购置图书^[14]。“那时在厦大图书馆里,可以看到英、美、法、德等国的一些期刊和西欧当年出版的图书,这使得来校参观的学者们赞叹不已”^[15]。著名学者浦江清1942年参观了长汀厦大图书馆,他在日记中写道,“西文书,凡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16]。民国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视察厦大后认为,长汀之厦门大学已成为当时国内最完备大学之一^[17]。这其中,图书馆的因素不可或缺。

厦门大学图书馆在建校第二年走上正轨,制定章程,编制目录,办理借阅。1926年馆务进一步开展,1935年读者服务活动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②。毋庸讳言,内迁长汀给图书馆带来了多方位的影响,到汀伊始,图书馆仅设有书库、阅览室和杂志室,馆员人数也有相当程度的缩减^③。随后馆舍面积迅速增辟,阅览环境大为改善。新阅览大厅建成后,分设文法、理学院、工商及西文杂志等四个阅览室。馆员也克服诸多困难,为全校读者提供必需的文献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图书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依然能按时补充前沿性资料。对于这一点,萨本栋在接受采访时亦毫不讳言自豪之情,“尤以一百二十种之西方杂志,始终能源源寄到,供诸参考浏览,此恐为内地任何大学所不及”^[18]。因此,图书馆成为绝大多数学生课余时间的光顾之所,以至常常开馆即告满座,“后至者往往向隅”^{[19](85)}。在此基础上,图书馆还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读者服务,如对普通读者延长开放时间,每天7点开馆,全日开放;调整借阅规则,每本书只能借阅1小时,后面无人借阅才可以续借^[20];

① 1921年厦门大学建校时,图书馆只是隶属于教务处的“图书课”,藏书不过500余册,第二年始独立而为“图书馆”。

② 1926年图书馆设办公室、阅览室和书库等三部分,其中阅览室分学生阅览室、教员研究室和阅报室,书库包括中西文书库。1935年俞爽谜任主图书馆,秉持“图书馆是活用的而非保管的”的理念,在读者服务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③ 《厦门大学校史资料》(第2辑)和《厦门院系馆所资料简史》皆提及迁汀前图书馆工作人员人数,一为9人,一为11人,而据厦门大学1938年度教职员名录,图书馆职员加主任共6人,因此无论采取上述哪一种说法,大幅度的人员缩减都是不争的事实。



为便利教授研究,特辟中国文学、历史、教育、商业、经济五个研究室;编制《国立厦门大学教育系各科战时补充教材研究参考书目及论文索引》,为教学提供精准服务;采购战时读物,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特定时间面向长汀当地民众开放图书馆,服务当地,开启民智。在这前后或同时,计划整顿书库;弃用造成较多讹误的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采用更适应中国图书馆界的皮氏编目系统,重新编制图书目录,等等^{[19](86)}。凡此种种,足见厦门大学图书馆于战事危情下的从容应对,体现出了高度的敬业精神与专业水准。

2.3 抗战胜利后复员与回归

抗战胜利后,厦门大学图书馆在学校的部署下,积极参与到复员回迁筹划实施工作中。厦门大学在接获胜利消息数日后即改应变委员会为复员委员会,又在厦门设立驻厦复员办事处,并特别将1945学年设为“复员年”,一切工作以复员为中心。学校一方面成立了留存鼓浪屿厦大校产清查委员会,清查包括图书在内的各类校产;另一方面,专门设置图书馆复员工作组,由教务长谢玉铭担任召集人,时任图书馆主任陈贵生作为工作组成员之一,负责整理长汀校区图书馆图书资料,准备回迁厦门本部校区;此外,还计划复员前后继续大量征购中外书刊,充实馆藏资源。由于厦门大学本部校区当时仍被用作日本战俘集中营,加之校舍损毁严重,因此一年级新生先行于鼓浪屿开课,学校暂时借用英华中学百友楼,设立图书馆鼓浪屿分馆,以保证所有读者都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文献资料借还阅览服务^[21]。与此同时,学校又派员到有关单位,清查、回收厦门沦陷期间散失的图书资料,但因战火殃及,前此留存的图书大都毁损,报纸则损失殆尽。

1946年6月,厦门大学图书馆复员返厦正式启动,当时《江声报》、《中央日报》(福州版)^①等报纸对这一过程皆有报道。厦门大学与漳龙汽车公司签订合同,专派卡车五百五十辆搬运仪器图书。由于当时长汀通往漳州的公路只修到水潮,故学校决定将整个运程分成陆路—溪流—海路三段进行,而在陆路与溪流之间一段路程,还需要雇用挑夫周转。为处理交接运送事宜,厦门大学特在水潮与漳州两地设立复员接运站,由校长汪德耀聘任学校教师数人分别担任两个接运站的主任和指导员,指定学生数人为助理员,凡图书等自长汀运达水潮、漳州时,凭

总务处或长汀办事处运单点收,如有件数不符、封条脱落或破损之类情况发生,责成押送承运人员,并立即报告长汀主管机构^{[19](222)}。接运办法制定详密,运送过程中虽水陆辗转,几经周折,最终陆续抵达厦门校区,以群贤、集美两楼为书库和阅览室,复员工作至此完成。统计数字显示,当时藏书量总计9万余册,书籍种类和藏书结构比之迁汀前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复员结束不久,厦门大学图书馆即向重庆、上海和海外订购中文报纸杂志100余种,英、法、德三国著名杂志刊物近300种,重要图书1500余部,以及其他教学参考用书等若干^[22],全力投入到支持教学与科研之中。截至1946年底,中西文图书杂志总数已有95875册之多^[23]。

3 厦门大学图书馆危机应对启示与实践^②

3.1 制定应急预案,系统应对危机

2006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保存保护中心发布了《灾害预防手册》^[24],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图书馆则根据不同的危机制定了具体解决方案^[25],这说明,制定应急预案已成为高校图书馆的一个重要指标。不可否认的是,国内高校图书馆在这一领域普遍存在薄弱环节。厦门大学图书馆曾有内迁长汀的宝贵经历,当时虽无应急管理的概念,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一个几近完美的范例而存在。世易时移,如今高校图书馆所面临的局势更为复杂,特别是厦门大学“一校两国三地四馆”^③的特殊格局,在应急管理方面平添许多变数。因而,在长汀经验基础上,制定系统的应急预案势在必行。具体而言,预案首先应与学校相关部门无缝对接,这样危机发生时才有可能争取到最大的支持。纵观内迁长汀以至复员返厦的全过程,可以发现图书馆一直与学校同荣辱共进退,无论是内迁前的图书文献装箱发运,还是在汀期间的馆舍改造、

① 1941年由《福建民报》改名而来。

② 本章节未标注数据和内容参见知网“2020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课程:图书馆疫情期间的运行与服务——以厦门大学图书馆为例。主讲人,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钞晓鸿。

③ 所谓“一校两国三地四馆”,是指厦门大学独特的分校(区)制度,厦门本部与马来西亚分校、漳州嘉庚学院分属两个国家,三个地方:翔安校区德旺图书馆、马来西亚分校图书馆与嘉庚学院图书馆呈鼎足之势,隶属于本部总馆或保持业务往来。



馆藏建设,抑或返厦前后图书资料的再次整理搬运,图书馆的运作都嵌入到学校的总体规划之中。这是此次危机应对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它给后来者的重要启示。而在当今全球化大背景之下,图书馆应对危机的平台已经从所在学校扩展到全国乃至全球图书馆界,图书馆单打独斗的时代成为过去,图书馆及相关行业联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厦门大学图书馆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中心成员馆、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及福建省文献信息服务中心,在制定预案时还应充分参考其他机构图书馆尤其是发达国家高校图书馆的危机预案,以便联合起来提高危机处理的工作效率。此次新冠疫情发生前后,厦门大学图书馆从元月24日起先后召开4次馆长办公会议,紧密配合学校防疫计划,并视疫情发展,制定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包括指定专门人员提前采购防疫物资;关闭图书馆所有边门,只留一个进出通道,所有人员体温检测入馆;本着“图书馆暂时关闭,服务永不停止”的原则,与CARSI平台、数据库商、超星数字图书馆等机构密切合作,推出以线上为主的教学科研服务;利用疫情客观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空档期,加强内部建设,组织人员进行图书除尘、消毒、清点和维护,等等。这些措施,既保护了员工,也获得读者好评。厦门大学图书馆已在网页公布了消防细则,跟厦门市消防局亦屡有合作活动,防台风预案也在历年“台风季”的考验中逐步完善^①,经过此次疫情的冲击,危急意识深入人心,目前需要做的是把这些整合起来,吸取相关机构的有效经验,制定一个综合而又全面的危急预案,并在危机发生时及时寻求多方支持,系统应对危机。

3.2 培养应急服务能力,拓展服务模式

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应急服务是应急管理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长汀厦大图书馆外在环境极端艰困,但仍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因而在当时好评不断,其后更化作鲜活的记忆,在不同的场合被频频提起,“尤其图书馆藏书的丰富,更非疏迁西南各大学所能望其项背”^[26]。以长汀时期校友刊物《厦大通讯》文章为基础的词频统计显示,图书(馆)成为校园设施类高频词,远高于其他同类词语^[27],可见当时厦门大学图书馆认同度之高。厦门大学“南方之强”的美誉即由长汀时期叫响,图书馆无疑是一个加分项,应急服务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但在科学技术昌明进步,读者需求日益多元

化、个性化的今天,长汀那种传统的单纯纸本文献服务方式已经难以满足使用者的需要。服务模式的多元化、服务内容的高科技含量成为新常态,应急服务标准也因此水涨船高,相应地对图书馆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虽在中国被有效遏制,但却于欧美等国家地区肆虐逞凶,如何让文献传输、课程直播及各种服务跨越千山万水,及时抵达图书馆的使用者,一时成为前所未有的考验。厦门大学图书馆响应学校要求,首先在图书馆原有Moodle网络教学平台的基础上,优化升级,推出SPOC平台;同时组建平台服务推广小组,先后发布三版平台使用手册,并开展线上培训,小组成员则加入学院教师网络授课技术支持群,即时解答平台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问题,协助学校如期开设研究生课程。开课以来,日均使用量超过4000人次。其次,利用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已有品牌“i学堂”,推出专题系列讲座《文献检索与论文编辑》,每期除主讲人外,另设2到3名助教,协助教学活动全方位开展,主题包括馆藏文献的检索与获取、文献管理软件导用、毕业论文编辑与排版,既回应各专业学生的共同需求,又密切契合特定阶段的毕业生群体需要^[28]。最后,闭馆之初即面向所有读者推出纸本文献预约外借服务,网上申请,指定地点统一办理外借手续,在最大限度满足读者需求的同时尽量减少人员聚集与接触,至4月21日已为400名读者外借图书近4000册。这些线上服务为主的措施,拓展了应急服务模式,图书馆因此主动出击到了教学前线,在学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显而易见,以上种种已经全面展示了未来应急服务的新领域、大方向。

3.3 顺应时代潮流,注重危机人文关怀

如果说“图书馆之所以能成为图书馆,之所以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至今,在社会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坚不可摧的图书馆人文关怀”^[29]。那么,在应急管理期间,高校图书馆尤其需要践行人文关怀。因为危机发生后,研究人员或团体对相关文献信息特别是二次、三次文献的需求应时而生,以研究攻关或为决策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多数普通读者,无论是舍图书馆无他的刚性需求还

① 厦门大学地处亚热带,背山面海,每年5—10月台风季,都会有强风暴雨,这是图书馆自建馆以来一直需要面对的危机。



是危机压抑下的心理需要,都亟须得到有效的回应。对前者,如何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以敏锐的职业眼光和长期以来形成的信息素养,先行收集、整理、加工文献资料,以便专题研究;对后者,如何精确识别这些缓急不一的文献需求,并给予相应服务,是未来图书馆应急管理重点所在。如前所述,长汀时期的厦大图书馆在这方面已有所践履,如根据实际需要设立教授研究室,延长开放时间等。受惠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文关怀突破时空限制呈现出别样的时代色彩。在这次“抗疫战争”中,厦门大学图书馆为尽可能照顾到读者的不同需要,推出了一系列线上服务,除前面所述协助研究生教学、专题讲座外,同时开展线上文献传递、科技查新、成果证明与知识产权服务,以满足读者特别是教学科研人员的应急需求。数字资源方面,与信息网络中心合作,在全力保障校外VPN访问图书馆资源的前提下,通过2019年加入的CARSI平台开通CARSI认证服务,让校外读者使用厦大身份即可直接访问12个主要常用数据库,此举走在全国高校图书馆前列^①,给因疫情滞留天涯海角的读者带来诸多便利。不仅如此,还开创性地推出了“数据库问题申报”特色服务,建立纠错机制,及时发现并解决读者的文献获取问题。而数据库试用与读者推荐服务,在特殊时期有效地拓展了图书馆资源,也直面读者需求,反馈良好。最后,图书馆还联合研究生院、教务处,持续推送“战‘疫’书单”^[30];与超星数字图书馆共同推出“21天共读之旅”阅读推广活动;阅读推广活动自有品牌“书香满庭院”亦从线下转为线上,与读者一起走入心灵之旅,共克时艰。但总体而言,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深度文献服务仍显不足,对在职图书馆员工的心理干预亦尚未正式提上工作日程^②。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危机预案即提出要重视灾难发生时员工的心理咨询和辅导工作^[31],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危机人文关怀才名副其实,也应成为厦门大学图书馆勉力追求的目标。

4 结语

综上所述,厦门大学图书馆在危机应对方面拥有可资借鉴的辉煌历史,从被迫内迁到胜利复员,时间长达八年之久,于艰困之中倾力助学,浴火重生,在图书馆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是图书馆在危机应对中的角色定位,还是危机期间的读

者服务,都可以给后来的应急管理以有益启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高校图书馆所面临的局势会更加复杂多变,厦门大学图书馆如何基于校情馆况,超越昔日的荣光,既有赖于长久以来的资源积累,更取决于现在开始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即制定全面系统的应急预案,培养应急服务能力,注重应急人文关怀,如是则再度书写华美篇章可以期待。

参考文献

- 1 周辨明.厦大迁汀两年来之变化[J].唯力旬刊.1939,2(7-8):37.
- 2 萨本栋致中英庚款负责人杭立武函件.续请中英庚款[A].厦门大学档案馆,卷宗目录号:040-56.
- 3 旅汀厦门大学同学会出版委员会编.一年来的本校[J].厦大通讯,1939,1(1):5.
- 4 厦门大学校务会议记录(一).请拨迁移补助费[A].厦门大学档案馆,卷宗目录号:055-20.
- 5 洪永宏.厦门大学校史:1921-1948(第一卷)[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161.
- 6 石慧霞.萨本栋传——民族危机中的大学校长[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70.
- 7 厦门大学同学会出版委员会.母校迁汀之后之图书馆[J].厦大通讯,1940,2(3-4):15.
- 8 教育年鉴编撰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10.
- 9 李超.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摧残[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5,96(2):12-15.
- 10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M].新加坡:南洋出版社,1946:263.
- 11 郑廷璋.对于本校图书馆之几点意见与愿望[G]//国家图书馆.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第2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125-128.
- 12 陈营,陈旭华.厦门大学组织机构沿革暨教职工名录[G]//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门大学校史资料:第5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18.
- 13 孙敦恒.萨本栋传[G]//陈武元.萨本栋博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244.
- 14 洪永宏.厦门大学校史:1921-1948(第一卷)[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205.
- 15 蔡启瑞,黄厚哲,陈碧玉,等.萨本栋与厦门大学[G]//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化资料丛刊:第8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46.
- 16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M].北京:三联书店,1999:199-200.

① 厦门大学是继北京大学之后第二所开通CARSI认证服务的高校。
② 厦门大学图书馆在疫情期间针对本馆离退休人员特别是空巢老人开展了一系列服务,参见随会系统直播:厦门大学图书馆战“疫”专题微党课, <https://private.suimeeting.com/share/j/1837834093>。



- 17 厦门大学同学会出版委员会.校闻补志[J].厦大通讯,1940,2(12):11.
- 18 挂林航.萨校长谈厦门大学近况[N].申报,1940-12-27(8).
- 19 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门大学校史资料:第2辑[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
- 20 潘懋元.潘懋元教育口述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9.
- 21 洪永宏.厦门大学校史:1921-1948(第一卷)[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238.
- 22 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门大学院系馆所简史:1921-1987[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365.
- 23 概况统计(第二册).国立厦门大学概况[A].厦门大学档案馆,卷宗目录号:012-8.
- 24 IFLA. IFLA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planning: a brief manual [EB/OL]. [2020-03-20]. <https://www.ifla.org/files/assets/pac/ipi/ipi6-en.pdf>.
- 25 王金茹,高波.美国大学图书馆危机管理实践及启示[J].图书馆学研究,2013(10):18-21.
- 26 林绍贤.我参加两次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竞赛[G]//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门大学校史资料:第二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113.
- 27 石慧霞.抗战烽火中的厦门大学[M].郑州:河南出版社,2015:167-168.
- 28 厦门大学.图书馆:线上开讲《文献检索与论文编辑》[EB/OL]. [2020-03-21]. <https://news.xmu.edu.cn/info/1015/8862.htm>.
- 29 吴晞.图书馆与人文关怀[J].图书馆,1999(1):46-47.
- 30 厦大图书馆.战“疫”书单(第一期)[EB/OL]. [2020-04-26]. https://mp.weixin.qq.com/s/I_R2-cbW9dEH8WnC4o9lKQ.
- 31 王磊,高波.国外图书馆危机预案制定现状及启示[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8(3):79-83.
-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图书馆,福建厦门,361005
收稿日期:2020年8月22日
修回日期:2020年10月2日

(责任编辑:支娟)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and Practice of Xiamen University Library's Crisis Response

—Taking the Relocation to Changting as an Example

Xu Wenlei

Abstract: Taking the crisis response of Xiamen University library during and after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traces back the historical event of Xiamen University library's relocation to Changting County through the review of the process of relocation, the development in Changting and the successful demobilization to Xiamen. It then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a series of measures and explores the wa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s well. The relocation to Changting County is a successful case of crisis response, which provides much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responses to the COVID-19 epidemic, including the formulation of emergency plans,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ency services and the concern of humanistic emergency care. It also provides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beneficial referen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Keywords: Xiamen University Library; Relocation to Changting County; Crisis Response